



辛亥革命

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

主 編：梁 川
執行主編：王 杰 徐英焰

宁夏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主 编 梁 川

执行主编 王 杰 徐英焰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梁川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12

ISBN 7-227-03372-4

I. 辛… II. 梁… III. 辛亥革命—关系—社会发展—研究—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57-53②D66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3494 号

辛亥革命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梁川 主编

责任编辑 戎爱军 龙瑞庭 陈志雄 张金超 张 冰

装帧设计 王 杰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高 伟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mm 1/16

印 张 33.875

字 数 800 千

印 数 1500 册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227-03372-4/K·387

定 价 13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辛亥革命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编辑委员会

顾问 陈绍基 柯小刚 周天鸿 杨 懂

主 任 邱金用

副主任 黄绍龙 梁 川

委 员 邱金用 黄绍龙 梁 川 王 杰 徐英焰

主 编 梁 川

执行主编 王 杰 徐英焰

编 辑 戎爱军 龙瑞庭 陈志雄 张金超 张 冰

“辛亥革命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学术讨论会综述

王 杰

值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围绕辛亥革命这一主题举办的研讨会在世界各地相继召开。辛亥革命领导者孙中山的故乡——广东的人民,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更是有着特殊的感情。为纪念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具完全意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广东省政协联合中山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和广东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辛亥革命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11月26~28日在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隆重召开。辛亥广东光复是11月9日,孙中山诞辰是11月12日,讨论会选择在11月份召开更具双重的纪念意义;这次会议应该是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讨论会中的最后一场了,我们可以充分吸取借鉴先期研讨会的优秀成果,虽不敢说“后来居上”,但显然利于我们研讨的深化与拓展;巧合的是,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场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讨会,即孙中山基金会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主办的“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在这里结束,21世纪头一年的全国有关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讨会也在这里闭幕。广东得风气之先,收获于后。各路学者再次给伟人的故乡带来了世纪和年度的丰硕学术成果,使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学术讨论会新见迭出。

事实正是如此,这次讨论会,在先期研究基础上爆发了不少学术火花。概述起来,有“四新”,曰:辛亥革命研究的新拓展,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新论点,史料研究的新发现,史学队伍的新生代。前三新为会议成果,后一新为会议昭示了未来与希望。

一新: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新拓展

这是本次讨论会的热门话题,争论非常激烈。围绕辛亥革命成功与失败,有三种观点:

(一)是辛亥革命成功了,又失败了。这是一个较为传统的观点,在以往林林总总的著作中,虽有文字表述之不同,论点可谓“不离其宗”,这里就不展开了。

(二)是辛亥革命失败了。论者强调,失败是正常的,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并不具备,无需以暧昧的用语来表述,因为它的失败不影响它的意义。持此论者认为,成功和失败用什么尺度去衡量,这里还有个定位问题,可以再事深入研探。

(三)是成功了,但成功得不彻底。对这种观点,又有学者提出质疑,要不要用“彻底”这样的定义,“彻底”是不是最好,值得研究。有学者回应说,彻底不彻底,孙中山曾有过表述,孙中山认为“不彻底”,我们因之可以就孙中山的结论作研究。还有学人指出,“如果否定了革命的彻底性,革命就不要搞了”。

关于对辛亥革命的总体把握问题:

有学者认为,对辛亥革命不管怎么评价也不过分。因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开端,它对社会结构变迁的界标远远超过1840年鸦片战争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论据是1840年以后中国的社会没有任何大的变动。1911年辛亥革命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是割断中国历史,辛亥革命才是社会转型的一次真正的伟大转折。对此,大多论者认为,

近代史开端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需学界认真讨论。要呵护学术争鸣,方能推动学术进步。

不同意见认为:1.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由于帝国主义的人侵,社会变化大,近代的启蒙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2. 辛亥革命终结了帝制,但封建专制社会仍没有终结;3. 近代的改革不是从辛亥革命开始,而是发端于清末,新政颁布了许多新的法律,建立了近代的法律体系。

对上述观点的争论,有学者认为,现在讨论辛亥革命成功与否,给辛亥革命作定论,似嫌为时过早,应该多做一些微观的研究,如把下层社会变动、社会心理、社会风俗等过去研究的薄弱环节做深做细,再来作总体把握也未迟。

围绕着辛亥革命的成败问题,视点很多,有学者运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来阐释,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政治斗争,因为单纯的政治斗争,不可能根本解决近代中国以来追求国家独立、富强、民主的目标。真正救国,要用文化的手段去提高国民素质,丰厚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因为“文化力”才是促进国家发展的基础。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

有学人认为,辛亥革命并非全民革命,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活动华侨与国内会党、游民和新军,所推动以武装流血改变,经各省士绅与高级官吏所赞助,而完成立即肇建共和,推翻两千多年皇帝独裁专制,并为全体中国人所默认的政治革命。这是一个新的论点,有利于辛亥革命性质研究的深化。

有论者对辛亥革命的特点作了归纳,认为这次革命有五大特殊性:一、滞后性带来急进性;二、民族性;三、超前性;四、日益扩展的群众性;五、延续发展性。

二新: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新论点

关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问题,与会者提交的论文不多,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黄彦提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上世纪初期中国人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他第一个提出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直接过渡”是以实行容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为中介的,在这个意义上是渐进式的过渡)。孙中山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单独在一个国家建立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的主张,计划以和平方式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它对后来中国和东方落后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黄彦强调,不能拿马、恩当年的观点来评判孙中山的社会主义。

对上述新观点,有学者表示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社会主义成分,但也有民粹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成分,后者是主要的。列宁和毛泽东的评论没有错,孙中山不是社会主义者。

另一种异议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但不是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极具兼容性的社会主义,既有科学社会主义成分,又有资本主义成分,还有中国大同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社会成分。孙中山曾经把他的民生主义比作德国俾斯麦的国家资本主义,比作俄国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比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行了一些公有的国家如英美等。因之,他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概念不能同日而语,可称为“孙氏社会主义”。

与上述观点相关,有学者强调指出,孙中山的思想极富包容性,他提出的是一种混合型的社会制度——既有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

三新:研究史料的新发现

挖掘新史料、提出新观点,是本次会议的又一大亮点。

赵立彬:《〈知止轩随录〉与辛亥革命的一页历史》,以新近公布的一部宗族史料——《知止轩随录》为例,说明在国民党正统史观的控制下,一个被排斥在正统之外的革命者宗族,如何苦心收集史料和期望弘扬自己的革命历史情状,其所包含的信息,已远远超出其史料价值本身。这一研究,颇具新意,把人们的研究眼光引向更广阔的视野。

汪叔子:《辛亥革命时期的商家动态》一文,通过介绍未刊史料《凌崇礼堂亲友信札》,阐述发微,阐释了辛亥革命时期商家的内部结构、经营模式、经济利益、政治要求等,为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内涵,增添一个新微观视角。

郑永福:《从理学家到近代实业家的王锡彤》一文,使用了鲜为人知的资料——王锡彤日记,解析王锡彤从理学家到实业家的心路历程及其矛盾演化,通过一位传统知识分子个案的剖析,从而揭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纷繁复杂的历史轨迹,从而展示了从传统到现代历史嬗变的壮阔画卷。

敖光旭:《从“武装和平”到“商人政治”——粤省商团问鼎政权之路》,该文首次大量引用孤本史料《粤省商团月报》,从崭新的角度,阐释了辛亥以后粤省商团发展的精神动因。粤省商团之所以能“驾上海而上之”,除了盗匪肆虐,商人要求保护经济秩序等客观原因外,他们还有自己的精神理念,即以民族主义为背景的“商战”及“武装和平”思想。文章同时探讨了商团由“在商言商”不涉政治到组建“商人政府”的转变机制和原因。

澳门学者陈树荣提供了十余通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各地支持他的亲笔信函,反映了时人对大总统的支持与欢迎样态。从更广阔的画面去展示社会心理的动态,从而拓展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联姻的广阔视域。

邱捷介绍了《香港华字日报》对研究辛亥革命的史料价值。此外,大多论文也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新史料,并在新史料的支撑下,提出了新的论点或深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四新:史学队伍的新生代

这是会议内容以外的“兴奋点”,令人喜出望外也。出席这次会议的40岁以下的学者将近40人,具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近30人,从他们的论文看,微观研究的比较多,功夫都比较扎实,这说明他们刻意在“十年磨剑”的内涵上向史学殿堂冲击,这是这次会议的潜在成果。这体现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事业生生不已、新人辈出的喜人景象,这是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研究领地的明天和希望。百年前,孙中山从翠亨大步走向世界,成就了他的伟业。相信这次会议后走向学术高峰的新生代,将会记得翠亨会议的鞭策,用优异的学术成果,来回翠亨村的“养育”与“栽培”。

从本质上说,研究就是创新,创新是学术的灵魂。这次会议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善于探索的精神,是故,新见层出。学术民主,则是科研事业繁荣的必要氛围,只有贯彻双百方针,才能使论者心情舒畅,各抒己见,相互切磋,推动科研的持续发展。当然,我们也必须强调和发扬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我们必须坚持学术民主,遵循学术规范,与学术无关的“风马牛”,都应该让它远离讨论会。

这次大会以辛亥革命与当代中国为主题,试图走学术与现实联系的道路,诸如对两岸问题,整合互信,统一民族大业等等的讨论,气氛融洽,思想活跃,为历史与现实服务提供了借鉴。

无巧不成书。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这次会议收到论文90篇(包括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的论文集)。还有4位学者5来论文,种种原因未及刊印分发(总计应是94篇了)。大会

还收到了中山大学、中山市委宣传部、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以及马小泉教授、张克宏博上赠送的著作12本(《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孙中山与祖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对国内情势的审视》、《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理想·道德·大同——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黄世仲黄伯耀弟兄南洋诗文集》、《伟人孙中山》、《孙中山与香山》、《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进程》)。可以预言,这次与会学者背着沉甸甸的成果回去,下次再来举亨,定能背着自己沉甸甸的学术成果回来,不亦乐乎。

辛亥革命史研究中,还有很多问题有待努力,如对广东妇女问题的研究,在这次研讨会上讨论得很热烈,并形成了如下共识:

1. 妇女研究乃辛亥基史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亟待深入拓展,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研究机构,以便统筹。
2. 女权研究不能离开国情,不能离开国家命运和政治问题。
3. 法律研究不光是“女权”问题,必须进行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不能只从文献出发,必须进行社会调查,以求真知。
4. 妇女问题研究要走三个结合的道路,即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结合,区域研究与全国研究结合。

另外,还有诸如关于辛亥革命与近代广东城市化、袁世凯与唐绍仪的关系、李经羲研究、辛亥话语问题、“中华民族”内涵的研究等,本次的与会论文均有涉及,学人已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新论点或新方法。这体现了与会学人研究的学术目光和前沿意识,可敬可佩。囿于文章不集中,未在会中形成讨论,这是本次会议的不足,但是,又是会议的成果。问题提了出来,初始的探讨见诸于文字,并在此次大会引起学界注目,自然会“一花引开百花开”。这些亟待探索的新论题,还都有待学者们下大工夫来解决,可喜的是,经已开了好头。

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研究,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学”,它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很多,倾力这一专题研究的学人也不少。但是,不能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差不多了,走到了尽头,本次会议的新史料、新发现、新观点足以明证,本次会议对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评价问题等等的热烈争论,以及对往后研究提出的一些建议,亦都足以说明。孙中山临终前给世人留下一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借此之意,我们可以说,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这一领域,研究没有穷期,同志仍须努力。

目 录

“辛亥革命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学术讨论会综述	王 杰(1)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化的革命	陈华新(1)
辛亥革命与世界潮流	王 杰(5)
辛亥革命: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	刘曼容(15)
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	陈国庆 乔志强(18)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改造	韩小林(25)
辛亥革命与思想启蒙	李喜所(33)
辛亥革命与社会进步浅议	陈世毅(39)
辛亥革命与近代道德建设	罗建军(45)
辛亥革命与思想话语的变迁	胡 波(53)
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联系及其他	郭世佑(68)
救国真难:20世纪中国精英的趋避冲突	朱淑源(73)
辛亥革命与儒家文化的命运	
——对清末民初“尊孔读经”问题的历史考察	田海林(89)
辛亥革命与新闻报刊宣传	徐松荣(99)
武昌起义前后《申报》政治倾向的演变及其影响	
——以《申报》对革命的报道为透视点	赵建国(106)
从反对裹足到参加民主革命	
——再论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妇女运动	徐 如(115)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与妇女运动	吕美颐(121)
略论辛亥革命时期“女德”观念的演变	
——以广东地区为个案分析	李兰萍(127)
辛亥革命对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	杨万秀(140)
辛亥革命与广东近代城市化(1911-1936)	张晓辉(144)
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的社会结构变迁论纲	沈渭滨(151)
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省临时议会	沈晓敏(162)
辛亥革命时期的商家动态	
——介绍未刊史料《凌崇礼堂亲友信札》并附浅议	汪叔子(171)
论太平天国对辛亥革命党人的思想影响	赵春晨(180)
晚清满汉关系与辛亥革命	朱东安(187)
新马华侨与辛亥革命	戴学稷(195)
南洋劝业会华侨参赛述评	乔兆红(199)
三洲田起义前后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	蔡惠尧(208)
广州“三·二九”起义的若干问题	赵立人(213)

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	邱远骥 (217)
从皇帝到总统:清末民初元首之更替与权力之解析	马小泉 崔跃峰 (225)
辛亥革命后“科学救国”思潮的社会影响	王业兴 (234)
正统史观下的国民党辛亥革命史研究 ——以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为例	李 瑾 (239)
再论孙中山的大中华思想	林家有 (245)
试论孙中山的忧患意识	陈金龙 (253)
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	陈剑安 (260)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再认识 ——读盛邦和教授的《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日本大亚洲主义》	张军民 (270)
论孙中山的外交思想与举措	周 妍 (276)
略论孙中山的行政管理思想	范耀登 (283)
试评孙中山的国家结构观及其演变	傅玉能 (292)
地方自治和国家统一:孙中山均权主义之研究	李继锋 (301)
从孙中山的国家统一观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	钟卓安 (309)
孙中山的统一思想实践与新世纪之祖国统一 ——兼论中共的对台统一方策	周兴樑 (315)
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与祖国统一大业	吴 仪 (327)
孙中山与两岸发展	姜新立 (335)
孙中山的经济现代化理想与深圳经济特区的现代化实践	乐 正 (338)
孙中山与若干旅华美国人交往史料的考证与补充	邓丽兰 (344)
论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原因	马庆忠 (349)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原因的历史反思与总结	邹佩丛 (358)
洪秀全与孙中山对耶儒的认识及推行革命的比较	李志刚 (367)
严复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罪人吗? ——兼评辛亥革命	颜德如 (376)
周震麟与辛亥革命	庄建平 (384)
香山县籍无政府主义者与辛亥革命及其变化	赵德钧 (391)
《知止轩随录》与辛亥革命的一页历史	赵立彬 (396)
从理学家到近代实业家的王锡彤 ——辛亥革命前后一个河南士绅的嬗变追踪	郑永福 (404)
李经羲与国会请愿运动	李振武 (412)
评黄世仲《辨康有为政见书》	方志钦 罗衍军 (419)
黄世仲之报业观评析	张克宏 (426)
辛亥议和袁唐关系刍议	刘路生 (431)
民初广东都督人选问题刍议	李吉奎 (437)
论中华民国时期伍廷芳的法律思想与实践	张礼恒 (445)
章士钊的民主宪政理念及其转变	郭华清 刘志强 (457)
评析胡汉民“党治”思想	葛静华 肖 杰 (464)

广东盗匪与清末民初的革命运动	
——从1895年广州起义到反袁讨龙运动	何文平(471)
清末广东禁烟运动与中英外交风波	王宏斌(484)
援闽粤军组建述论	黄绍平(498)
无奈的选择:20年代末广州市民自杀透视	刘正刚 乔素玲(507)
国民党“一大”前后大元帅府的历史地位	谢淑娟(512)
国共两党的分合与祖国统一	余从荣(520)
后 记	(527)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化的革命

陈华新

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场革命,在我国近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都对中国近代化进行过有价值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继承和发扬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中国人对中国近代化的探索精神,并掀起了一场近代化的革命。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由“中国的旧式骚动”,“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旧式的骚动”,是中世纪式的农民暴动,“自觉的民主运动”,是近代化的革命。可见列宁也肯定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化的一场革命。

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对革命不利,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紧密勾结在一起,向革命势力进行软硬兼施的进攻;不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肩负起领导这场革命的历史重任,其本身存在不可克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革命的失败命运。正如后来孙中山先生总结革命的失败教训说:“革命虽成功,……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①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的领袖,严于律己,以为后来的革命总结历史教训,这种态度是可贵的。但是,作为历史学家,却不应对于辛亥革命有苛刻的指责。恩格斯说:“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难免会做出许多蠢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以致能够重新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对革命过程出现的缺点,采取宽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没有白流,它的历史功绩将永远彪炳史册。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近代化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政治的近代化。近代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经历了军事、经济、政治、思想四个认同。辛亥革命标志着对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认同。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封建统治,结束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长期以来,皇帝被奉为“天子”,所谓“君天下曰天子”。皇帝被当作天的儿子,神的化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的话是圣旨,是万民必遵的律令。“君无戏言”,凡是皇帝说过的任何一句话,臣民只有俯首恭听,丝毫不能怀疑,否则便被加上欺君犯上大罪。甚至皇帝及列祖列宗的名字,臣民写文章和说话都要避讳,否则便是口无君上。可是,辛亥革命的历史风暴,打破了对皇帝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迷信,把它从“九五之尊”的宝座上拉下来了。革命党人不仅敢直呼皇帝的名,还宣判他为“未辨菽麦”的“小丑”,祸国害民的“独夫民贼”。孙中山先生在《同盟会宣言》中,就提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4页。

出永远废除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说:“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①以后,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党人,一直把创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奋斗目标。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纷纷响应,“一律承认共和国体”。孙中山先生回国后,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宣誓就职,在《就职宣言》中,指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任务,为“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②。并向世界郑重宣布:“吾中华国民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国诸友邦”^③。孙中山先生缔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无异在古老的中国地平线上,升起了一道新时代的曙光。尽管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昙花一现,但它却在中国政治近代化方面迈进了可贵的一步。

政治近代化最重要的特征是政治世俗化。所谓世俗化,在西方表现为政教分离。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是政教一元化的政治,被视为神学“最高思想权威”的阿奎那,就认为“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④,认为封建等级制度是根据上帝的旨意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政治“秩序”。恩格斯曾指出:西欧“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教会信条自然成了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⑤。直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西方民主政治,政治才走向世俗化。中国政治世俗化,则表现为冲破神权统治。从中国出现第一个王朝夏朝,到辛亥革命前,中国政治特征是建立在神权统治的基础上,董仲舒鼓吹的“天人合一”论就是神权统治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辛亥革命后,才第一次走向世俗化。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不是“神授”,而是选举产生的。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也不敢明目张胆宣扬神权政治。北洋军阀统治的更替,也与封建专制统治的神权政治,有明显的不同。蒋介石建立的国民政府,更是打着“国民”即政治世俗化的旗帜。可见辛亥革命后尽管政局多变,但政治世俗化的道路并没有改变。

其次,经济的近代化。以“求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立了第一功。而辛亥革命的爆发,更为中国经济近代化开辟了广阔道路。辛亥革命的洪流,是随着收回利权(矿权、路权)、抗捐抗税等民族觉醒运动而高涨的。辛亥革命的结果,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这就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尽管经历了不少王朝更替,但“崇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政策一直没有改变。社会地位的排列是“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低于农和工。在科举制度中,商人的子弟被视为出身不好,不能应试。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官员投资近代企业,也往往要用化名,办企业没有做官那样体面。可是,辛亥革命后,这些传统的经济观念被打破了,办企业被当作一件荣誉的事情,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就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和奖励民族工商业的法令,鼓励私人办实业,并以实际行动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企业公司。在革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各种实业团体,从而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经济近代化方面迈进了一步。1912年上海成立工商建设会,该会曾充满信心地表示:“今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生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⑥,认为中国从此进入“产业革命”的新时代。民国初年中国民族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据统计,1903年到1908年,即同盟会成立的前后,平均每年注册的工厂仅有

① 《孙中山选集》,第78页。

② 《孙中山选集》,第90页。

③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

④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5页。

⑥ 1912年2月28日《民声报》,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62页。

21.1家;而辛亥革命后,1913年到1915年,平均每年注册的工厂就达41.3家;1916年到1919年,平均每年达124.6家。仅十多年间,工厂的增长速度便达六倍。^①1913年至1920年,在轻工业的23种类别中,新设厂有657家,其中以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发展速度更快。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在对外贸易上,出口商品增加,进口商品相对减少,因而入超数字也大大减少。1914年入超2亿1千3百多万两,1919年入超减至1千6百多万两,仅5年入超额便降低了92.5%,个别商品甚至呈现了出超。如面粉工业1912年入超256万多担,1915年变成出超5.79万担,1919年出超242万多担。^②辛亥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称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人统计:1913年工业投资总额4987.5万元,1917年增至12824.4万元,1920年增至15522.1万元^③,七年间增长了三倍左右。

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在经济问题上也不敢倒行逆施,他任用周学熙为财政总长。周学熙是民初北方财政、实业界的巨擘。周学熙任财政总长期间,倡行烟酒公卖及清理官产,创设中国实业银行与大宛农工银行,还在天津、青岛、唐山、安阳开办华新纱厂等企业,为中国经济近代化出过力。中国近代一整套经济法规,正是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逐步完成的。北洋政府还试图统一币制和统一度量衡,虽然由于军阀混战而未实现,但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也很重视经济法规建设,并形成一整套经济法规,对中国经济近代化起过积极作用。可见辛亥革命后,尽管政权易帜频繁,但在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道路上,却没有走回头路。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任何个人无法阻挡的。

再次,文化思想的近代化。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播,传统文化思想受到严厉的挑战,由挑战、冲突而走向认同。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历程,尽管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但如果从本质来考察,离不开民主与科学。以民权、自由、平等为特征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君权、专制、等级为特征的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统治地位。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到康梁发起的戊戌变法运动,都带有思想解放意义。但太平天国运动推翻清朝,是为了建立新天朝;戊戌变法要求改革君主专制,是为了建立君主立宪制。而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帝国”,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民国”。从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来看,是太平天国和戊戌变法所无可比拟的。自秦始皇建立君主专制统治,到辛亥革命以前,“民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历代农民战争的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无不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即使带有资产阶级性的维新运动,也只看得到君主专制不够完善,要求变君主专制为“君民共主”。没有皇帝而能治天下,被视为海外奇谈,异端邪说。打倒皇帝而不拥立新皇帝,谁也不敢想。只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才破天荒地提出推翻帝制。他说:“照现在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仅要消灭帝制,而且要消灭皇帝思想。“因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④1905年至1907年,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革命派与保皇派,在政治思想领域展开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有三:一、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二、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三、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这次大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终。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哀鸣道:“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律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

① 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1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页,表3。

② 侯厚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版,第114—115页。

③ 黄炎:《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19页第18表。

④ 《孙中山选集》,第82页。

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使保皇派“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①革命派在论战中的胜利,使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得到广大华侨和爱国知识分子的拥护,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传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共和的思想,大大推动了文化思想的近代化。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到三个月,便由孙中山先生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总纲中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便在法律上肯定“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彻底否定帝制,宣告任何“帝制自为”是国法所不容的。虽然这个约法后来由于袁世凯的攫夺革命果实而没有实行,但它肯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共和国“合法”、帝制“非法”的政治观念,大大促进了人民的民主主义觉醒。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一文说,辛亥革命破坏了君主神圣的偶像,使皇帝“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②既然皇帝君权可以推翻,帝制可以铲除,皇帝的偶像抛进了粪缸,这意味着与传统思想的决裂,必然大大促进文化思想的近代化。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先生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法令。如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礼节,革除“大人”、“老爷”的称呼;改革教育制度,实行男女同校,禁止尊孔读经;改革封建陋俗,剪除辫子,禁止缠足,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实行男女平权;禁止歧视“堕户”(水上居民)”等所谓“贱民”,在法律上人人平等;等等。在这些法令中,提出了“人权神圣”和“自由、博爱、平等”的响亮口号,^③这种批判封建传统思想,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五四”运动。

塞缪尔·亨廷顿说:革命“是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方式”,“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④。他这里所说的现代化与我所说的近代化,实为同义词。我们从辛亥革命的实践中,印证了亨廷顿的这一论点是正确的,辛亥革命确是中国近代化的一场革命。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历史系)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607-608页。

② 《新青年》卷五2号。

③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第29页。

④ 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译本第287、28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辛亥革命与世界潮流

王 杰

日历翻至 20 世纪的时候,中国历史和世界潮流已结下不解之缘。

20 世纪的世界,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文化社会化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西方以近世文明暴发户的姿态,强行向东方施压,“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①。辛亥革命运动,作为近代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后继者,在世局西化的应变中,既脉承了前者的思绪,又超越前者的气魄和业绩,勇于与世界潮流融会在一起,导演了中国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辛亥志士给后人留下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可谓取不尽用不完。

辛亥革命迎汇了世界潮流

如果我们把孙中山誉为辛亥革命的伟大旗手,那么应该说,是孙中山慧眼识潮,认准了 20 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这里主要指日本留学界)已迎汇世界潮流的取向。20 世纪伊始,以梁启超的《过渡时代论》及《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 20 世纪世界之前途》引导人们注目世界潮流为嚆矢,《国民报》发表了《20 世纪之中国》一文,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命运与世界潮流融会的问题。该文指出“20 世纪将为支那人之世界”的鼓噪,实为欧美、日本列强“忌我中国之言”,决不能沾沾自喜而忘却自己的历史使命。支那人如果是只知朝廷而无国家,置“驯服柔顺安之若素”,任由列强对清廷“擒之纵之威之胁之”,而领土、主权、资源任人掠夺,则“20 世纪之中国,将长为数重之奴隶矣”。作者以感时伤世的深情警示国人:“呜呼!今日已 20 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20 世纪之支那》之发刊词更是有感而发:“20 世纪之支那,依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国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吾人爱之,不能不决此疑问也。”

对国家危亡的忧患自然引发救国思绪之萌生。西方文明固然渗透着血腥味,而“国种”之优劣有赖识时者之觉醒。正是由于一批具忧患意识及与时俱进者的呼唤,促进他们在警醒中主动去审视世界之潮向,是以,以日本明治维新而国运兴盛为鉴,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呼唤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中国大地播扬。

呼喊民族主义最着力者,《浙江潮》可谓首着先鞭,它在第 1 期、第 2 期中连载《民族主义论》一文,最具号召性:“19 世纪 20 世纪之交,有大怪物焉,一呼而全欧靡,而及于美,而及于澳,而及于非,犹以为未足,乃乘风破浪入于亚。”这个“大怪物”为何?民族主义是也。它暗示西方铁蹄之无孔不入,由帝国主义侵略而引发的民族竞争必然激荡于 20 世纪。文章尖锐地指出:“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5 页。

呼唤民权主义的文字尤多,《开智录》刊发《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20世纪之前途》一文,说理颇为辩证与深刻,其中一段写道:“今天下之人士之想望文明之时代,全是自由与公义之世界也;又战争之事,虽或不能绝迹,而亦必希。此不过梦拟之想耳!实际20世纪之自由公义之腐败,必过于19世纪之末。何则?19世纪之末之狄塔偏主义^①,未如20世纪之盛,所以自由与公义,20世纪不及19世纪之末,19世纪之末又不如其前半期也。然则经20世纪之后,不反退化耶?是又不然。自由与公义之腐益盛,则人之想望也益盛,而提倡也益力,如中世君权之专压,实是以开近世之民权而已。故20世纪末之自由与公义之发达,必与19世纪之民权等矣。”

上述两例,旨在说明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思维聚焦在对民族、民权的期盼与实践,章太炎为亚洲和亲会草写约章,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更进一步表明他们要用全亚洲的力量,去抵御列强侵略,扶助亚洲民族民权的振兴。

孙中山对20世纪世界潮流的理解,应该说要高出同侪一筹。他早年求学于西方,在西式教育中潜移默化地积淀了对世界文明的体认,又从伦敦蒙难的切身感受去升华对世界潮流的追求。可以这样认为,他对西方文明的两面性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进而对迎汇世界潮流有自己独到而执著的理念。

取法乎上,这是孙中山迎汇世界潮流的最为可贵的品格。

取法乎上,含两层涵义:一曰跟上时代潮流,二口适合中国国情。

所谓时代潮流,不言而喻,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民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取法乎上,就是要跟上时代文明的潮头,既然民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潮流,中国就必须选择民主共和政治的方案去试验。1905年8月31日,孙中山在东京留日学生欢迎会演讲,面对中国的知识精英,就民主共和政治与世界文明以及“取法乎上”的关系作了极其辩证的阐释。据吼生留下不足4000字的笔记中,孙中山关于文明的表述出现了21次^②,平均180个字中就出一处“文明”。孙中山列举了不少平实的例子,强烈地抨击那种怀疑中国同胞不能共有的说法,“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不知享这共和幸福的蠢动物了”。鉴此,“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孙中山还特别针对当时保皇派所散布的“中国此时的政治幼稚、思想幼稚、学术幼稚,不能猝学极等文明”等一类反对从高层次下手效法西方文明的论调,以欧洲著名各大家用数十年之功发明一机器而后学者不过学数年即能造作为例证,说明对西方文明必须取法乎上的理意。最后痛切地指出:“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若此时不取法他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我们决不要随大流的变更,定要为人所变更,其进步方速。兄弟愿诸君教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

孙中山文明理念揭示“取法乎上”的政治认知,不仅在于强调采行民主共和方案为文明政治之时尚,还在于旗帜鲜明地阐明“君主立宪之不合用于中国”的政治态度,从而指明中国的文明道路必须坚持民主革命派同保皇派作殊死斗争的航向。在孙中山这一文明思想指针的指引下,同盟会领导下的《民报》与梁启超等主笔的《新民丛报》进行了持续两年的思想论战,使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赢得了论战的胜利,尔后,以民主共和政治为最高文明理念成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主流思潮,导

① 狄塔偏主义:即 Dick Turpin,指帝国主义。

② 据石川横站先生研究,1875年刊行的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畅销一时。“明治前半期的日本也是‘文明’的全盛时代,世界是通过‘文明’这一镜头被认识的。”参见《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袁英何育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孙中山演说中频繁“文明”使用频率,似乎受日本文明氛围感染颇深,其中还包括“笔记”。